

鲁迅与现代中国“小说”的语义转换

吕仕伟

【摘要】 鲁迅是现代中国“小说”语义经验转换的参与者。鲁迅确认了中国古今小说可观风俗的稗史价值，以小说文类传递现世慰藉，是小说之为“小道”观念的改造者；鲁迅持续揭底古今小说的文人帮闲伦理，寄寓小说以发见平民社会本相的文体期许，是小说之为“文学”思潮的清理者；鲁迅饱受中国小说消闲影射批评的困扰，以己身的有闲致力于诚正的小说实践活动，是小说之为“闲书”认知的突围者。传统小说认知在鲁迅的文化实践中发生正向思想转换，对鲁迅的小说话语进行学理梳理，不仅有益于发现鲁迅在政治、文化、社会层面多维的小说学贡献，更可理清现代中国“小说”的古今语义转换。

【关键词】 鲁迅小说 小道观念 闲书认知 语义转换

近年来，学界在中国“小说”概念的古代语义演变、中西经验对接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¹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小说”语义变化亦有其文化主体性、社会历史性，“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中的古今语义转换亦值得重视。现代中国“小说”有其多维的复杂认知形态。如在文化地位上，小说依然延续着传统“残存小语”“稗官野史”等卑下的“小道”历史语义；⁽²⁾而在大众的固有认知中，小说被普遍认作是传统文人报私仇、发私见的影射文字，是庸俗、消闲的“闲书”；⁽³⁾而在一部分现代知识精英的文化诉求中，小说被要求成为“文学之正宗”，古今小说纷纷被“抬入文苑”。⁽⁴⁾以此，传统小说认知在现代作家的文化实践中获得怎样的现代语义经验转换，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鲁迅是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文化观察者，更是此中小说语义经验转换的参与者。对鲁迅的小说话语进行学理梳理，不仅有益于发现鲁迅在政治、文化、社会层面多维度的小说学贡献，更可理清现代中国“小说”的古今语义转换。

一、小道与小说：从稗史理性到现世慰藉

周作人曾评价鲁迅：“对于正宗的诗文说都无什么兴味，因此可以说他走的乃是旁门。”⁽⁵⁾可以说，区别于诗言志、文以载道的文类价值追求，鲁迅的“旁门”取径正在于小说。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作为“小道”之小说的传统语义经验在鲁迅的话语中也并未脱落，在不断的思想反省、文化实践中，鲁迅确立了中国古今小说的现代价值。

第一，从历史语义上来看，小说是稗史，源于史而又异于史。鲁迅以其多维的小说话语确认了古今小说可观风俗的社会功能，中外短篇小说尤其成为鲁迅发现、速记社会时事真相的“史余”镜鉴。

一方面，“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⁶⁾作为学者的鲁迅对古代稗史小说“可观风俗”的社会功能是异常清楚的。另一方面，鲁迅的现代小说话语也显现出以小说观社会风俗、以短篇小说作稗史镜鉴的思想维度。鲁迅在谈到《孔乙己》作法时说：“这一篇很拙的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⁷⁾鲁迅以短篇小说对现代中国社会风俗境况进行见证摹写，小说的朴素历史本质与风俗观照功能在此可见一二。在鲁迅的小说编辑出版理念中，往往又将小说的图文设计与古史的记言记事联系在一起。在谈到小说连环画及《死魂灵百图》时，即认为此图画“可以和小说相辅，所谓‘左图右史’，更明白十九世纪上半的俄国中流社会的情形”。⁽⁸⁾在鲁迅的小说翻译观念中也闪烁着小说之为稗史的观念意见。在译介国外短篇小说时鲁迅即表示：“我译这篇的本意，既非恐怕自己没落，也非鼓吹别人革命，不过给读者看看那时那地的情形，算是一种一时的稗史。”⁽⁹⁾鲁迅反复言称自己小说与艺术的距离，以短篇速写观社会风俗、以稗史作时事镜鉴的思想旨归在此可见一斑。

第二，从政治诉求上来看，小说虽出于史，但又表现出异于史的在野政治面目。鲁迅往往以游勇的个人姿态表达对官方“读经”意识形态的拒斥，将野史杂说等中国传统小说作为揭底民族历史真相的文化武器，稗史小说成为鲁迅在野立场的政治表达形式。

就政治社会语境来看，二十世纪初期复辟、复古声调此起彼伏，“读经”倡导是复古政策的文化宣传形式。自1905年《奏定学堂章程》小学堂有读经一科引起讨论以来，及至1925年教育总长章士钊再次主张“读经”，黎锦熙、刘炳藜等人进行关于“读经”教育原理的辩论，读经讨论又起。但诚如鲁迅所说，“民国十四年的‘读经’，也如民国前四年，四年，或将来的二十四年一样，主张者的意思，大抵并不如反对者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¹⁰⁾。“读经”不仅是文白之争的延续，更是“在官言官”的上层意识形态构建，⁽¹¹⁾鲁迅、吴稚晖等人揭底了“读经”倡导背后的反对白话意图，洞穿了以“救国”为名的愚民目的。鲁迅尤其以其“读过十三经”的经验，作《十四年的“读经”》《评心雕龙》《这个和那个》等时评杂文，认为“读经”是“阔人们将人们看作笨牛，是要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道明了“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等由来已久的政治文化专制传统。^⑦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读经”的拒绝姿态中，区别于1925年前半年“青年必读书”论争的“不读中国书”建议，面对“读经”政策，鲁迅在《这个和那个》中公开号召读野史杂说。野史杂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类别，是区别于庙堂经史文化的在野思想形态呈现。在鲁迅看来：“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¹²⁾鲁迅指责正史经传的意识形态服务功能，批评其掩盖真实历史的政治服务性质；鲁迅希求民众从野史杂说中获得人生本相，寄予了野史杂说以启蒙潜能；鲁迅通过阅读宋明野史对民族处境作出危机体认，对国家时局作出历史理性的知识结构性理解。可见，野史杂说阅读立场不仅是鲁迅解放病态历史、进行现代疗救的教育寄寓，也成为鲁迅文化理性、政治理性的表达。

第三，区别于立言传世、以将来之名规训现世的传统写作形式，鲁迅小说保持着对现实时间的关注，打破了传统写作对道德因果关系的依赖，小说创作尤其成为鲁迅实现现世人道主义的安慰和希冀，“小道”之“致远恐泥”价值在鲁迅那里发生了正向转换。

一方面，小说之“小”的文化经验在鲁迅那里转化为一种个人立场。王瑶在《小说与方术》一文中对小说之“小”的性质有所说明，认为小说“作者本不是为了立言或不朽才著述的。因而所述的异闻奇事也就只注重在事情的性质和意义，而不注重在文辞结构或人物；这本是街谈巷语的东西，所以叫做‘小说’；是和成一家言的大人先生之说不同的”⁽¹³⁾。正是在此种意义上，鲁迅尤其拒绝成为立言的“大人先生”。鲁迅认为自己“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¹⁴⁾，鲁迅反对将自己的小说采入教科书，怕教坏青年，⁽¹⁵⁾鲁迅在谈到《阿Q正传》时尤其强调自己不是一个“立言”的人，说自己做的是“速朽的文章”。⁽¹⁶⁾鲁迅以“正传”作小说，在对不朽传统的怀疑中达成对小说文体的认同，对“文体卑下”、“引车卖浆者流”的小说作出了民间价值体认，以“速朽”彰显了小说的时效文体价值。鲁迅反对自己的小说成为训诫他人的“大道”，流露出对小说之“小道”价值的认可。

另一方面，经史书写乃至传统文人小说书写往往以道德循环观念吞没日常时间意识，以使人们作出面对永恒的准备。鲁迅小说以其对现世时间的关注，以文学的虚构功能传递出当下时事的情感慰藉。与“主张离开人生，讲些月呀花呀鸟呀的话”或者“专讲梦，专讲将来的社会”的文艺不同，⁽¹⁷⁾鲁迅曾借着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话语感叹道：“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只要现在的梦。”⁽¹⁸⁾基于为人生、为当下的启蒙诉求，鲁迅在小说文类上寄予了现世好梦的希冀，尤其在《呐喊》中用了希望的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凭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在文化经验上，中国小说有着“致远恐泥”的价值取向，在不朽道德未来与现世人生好梦的抉择中，鲁迅以其旁门的文类取径传递出对“致远恐泥”价值的现代确认。总的来说，在西方小说观念的作用下，鲁迅以小说文类的虚构合法性保留了对现实的重塑能力，以小说文类的虚构手段缓和了革命现实存在的残酷暴力；以文学的审美功能净化恐惧，以虚构的微小希望慰藉苦痛，鲁迅真正以小说文类“致远恐泥”的现世价值给来者带来了“极微末的欢喜”。小说之“小道”在鲁迅那里内含着现代人道主义思想关怀，“致远恐泥”的中国小说在鲁迅手中发生了文类价值

层面的思想转换。

二、文学与小说：从帮闲伎俩到平民文体

实际上，从梁启超提倡“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¹⁹⁾，小说更多表现为“改良群治”的工具，即便梁启超本人依然是重诗文而轻小说。虽有小说是文学最上乘之说，但小说的“文学”价值倒是其次乃至近乎微末的。小说与“文学”发生明显的话语联系是在“文学革命”期间。如陈独秀言：“国人恶习，鄙夷戏曲小说为不足齿数，是以贤者不为，其道日卑。此种风气，倘不转移，文学界绝无进步之可言。”⁽²⁰⁾胡适尤其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言道：“今人尤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²¹⁾陈独秀、胡适意图将小说纳入正统“文学”，小说之为“文学”在“文学革命”期间发生了语义的快速建构。

但以鲁迅的小说观念来看，身为“文学革命”的大将，在促成小说成为“文学”这一环节却是疏离者。鲁迅坦言“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坦陈自己“没有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²²⁾尤其辩解“有人说我是‘文学家’，其实并不是的”⁽²³⁾，“不想充‘文学家’”⁽²⁴⁾，“诸君的所以来邀我，大约是因为我曾经做过几篇小说，是文学家，要从我这里听文学。其实我并不是的，并不懂什么”，鲁迅表露着“对于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讲的文学的议论”的怀疑态度。⁽²⁵⁾但同时，鲁迅也看到，“小说家的侵入文坛，仅是开始‘文学革命’运动，即一九一七年以来的事。自然，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²⁶⁾，且“几本小说销到上万，是我想也没有想到的”，⁽²⁷⁾鲁迅未曾料到“文学革命”能取得如此实绩，未曾预料到自己“听命”下的小说创作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语义经验的变化往往伴随着古老文化传统和新兴文化思潮的裂变，在小说之为“文学”的语义发生过程中，尤其充满社会新思潮带来的文化张力。此中，对小说之为“文学”保持疏离的鲁迅也以小说史学者、小说家、小说文化批评家身份“侵入文坛”，小说内涵的民族劣根性与启蒙价值被鲁迅开掘出来。

其一，在小说语义转型中，鲁迅持续揭底传统小说固有的文人弊病，对小说之为“文学”的“帮闲”性质作出批判，以己身的学术研究与社会观察对古今小说的文人性、文学性弊病进行了清理。

具体来看，鲁迅对《游仙窟》等佻巧的文章并不看好，认为《蟬史》等小说“华艳而乏天趣，徒奇崛而无深意”，《镜花缘》等雍乾以来小说“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不能自己，则博识多通害之”，《野叟曝言》“衍学寄慨，实其主因，圣而尊容，则为抱负”，显露了理学家的心理，⁽²⁷⁾尤其在评论小说批评家金圣叹时，认为小说“经他一批，原作的实诚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做法上”⁽²⁸⁾。“若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²⁹⁾，在鲁迅的学术探究中，真正的小说既不在于炫学也不在于教训。

古之小说如此，而现代小说之为“文学”，离不开西学产物“文学概论”的建构。诚如鲁迅所言，“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但一经西洋的‘文学概论’列为正宗，我们也就奉之为宝贝”⁽³⁰⁾，“从五四运动后，新文学家很提倡小说；其故由当时提倡新文学的人看见西洋文学中小说地位甚高，和诗歌相仿佛；所以弄得像不看小说就不是人似的”⁽³¹⁾。而借着“文学”之名，小说地位提高之后，其狡狴、诈伪性更甚。在鲁迅的社会文化观察中：“近十年来，文学家的头衔，已成为名利双收的支票了，好名渔利之徒，就也有些要从这里下手。而且确也很有几个成功：开店铺者有之，造洋房者有之……陷害了敌人或者连并无干系的人，来提高他自己的‘文学上的价值’。”⁽³²⁾在现代商业刺激之下，鲁迅看到，“我到上海后，所惊异的事情之一是新闻记事的章回小说化。无论怎样惨事，都要说得有趣——海式的有趣。”⁽³³⁾鲁迅观察到的是，在现代印刷经济勃兴的民国社会，在文人“这一面旗子的掩护之下，建立着害人肥己的事业”⁽³⁴⁾，文人借着小说之为“文学”的名义，“帮闲”特性愈发显露。

其二，在中西文化经验对接过程中，鲁迅洞穿了“文学概论”兴起的文学商业化伎俩，以持续的社会批判匡正现代小说的发生秩序。鲁迅在小说市人本位立场中找到了民族新生的价值旨归，在小说中寄寓了工农思想解放的文体期许。

鲁迅深受“小说界革命”以来小说启蒙工具论的影响，对小说的文学性、理论性较少作探讨，如认为自己的小说结集“不过蒙着小说的名”⁽³⁴⁾，以“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³⁵⁾。尽管鲁迅“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³⁶⁾，又不得不面对社会流行的小说创作说法。面对长篇小说创作的社会批评话语，鲁迅表态道：“托尔斯泰将要动笔时，是否查了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之后，明白了小说是文学的正宗，这才决心来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的呢？”⁽³⁷⁾对“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的文学创作理论话语，鲁迅也不以为然：“不过一个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³⁸⁾鲁迅对所谓“作者案照他在社会上有存在之可能，凭空造出”的“典型人物”论尤为不满，论其为“吃语”。⁽³⁹⁾应该说，鲁迅的小说视野从来不是小说的文学性本身，特别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鲁迅往往将诸种文学创作理论作了社会经济层面的理解。在鲁迅看来，“文学概论”尤其成为“文学家”的商人伎俩，市场上陈列着的“小说做法”、“小说法程”之类，是专掬有志于创作的青年腰包的。⁽⁴⁰⁾在鲁迅视野中，“文学概论”“小说做法”轮番上场，是浪费笔墨编纂事实。小说家化身理论家，读者与作者的文学消费互动不仅加剧着小说的滥造，以文学概论为商品的文学消费更加剧了“文学”概念的“名利”语义。

更进一步来看，鲁迅反对文人、文学家对小说的采录和润色，意图通过小说文类的本真民间立场呈现社会的本来面目。对于“文人”，鲁迅曾言：“我宁可向泼刺的妓女立正，却不愿意和死样活气的文人打棚。”⁽⁴¹⁾而对于“文学”，鲁迅表示：“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所有的文学，歌呀，诗呀，大抵是给上等人看的。”⁽⁴²⁾在鲁迅的理解中，小说需要正直地叙述与现实的关系，鲁迅对小说文人性的批判呈现了己身平民阶级取向的文学追求。诚如鲁迅所说，“中国底小说和诗实在比不上别国，无可奈何，只好称之曰文学；谈不到革命时代的文学，更谈不到平民文学。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¹³⁾。为了不使文艺与大众隔离，鲁迅把己身的文学追求放置在中国小说文类固有的市人语义层面，小说文类内在的市人语义成为鲁迅的“文学”抉择，平民阶级文学、工农思想解放成为鲁迅为现代“文学”发展指明的方向。

三、闲书与小说：从消闲影射到有闲启蒙

诚如鲁迅看到的，“中国久已称小说之类为‘闲书’”⁽⁴³⁾，“闲书”概念对于认识二十世纪初期小说的社会语义尤其重要。从文化源流来看，古代小说的起源在于民间的口头创作，源于先民们平时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辞，闲话是小说的早期发生形态。从文化功用层面来看，“闲书”是供“看官”们茶余酒后消遣之用的，⁽⁴⁴⁾小说往往“无关大体”，能够“得遣闲时”。⁽⁴⁵⁾可以说，小说被认作“闲书”意味着这样的文化事实：“中国国人到了现在，还不明白什么是小说，只晓得天下有一种‘闲书’，看的人可以拿他消闲、做的人可以发挥自己意见、讲大话、报私怨、叹今不如古、胡说一番。”⁽⁴⁶⁾以此，阅读小说被认作是遣兴娱乐的“看闲书”，创作小说被认作是文人报私仇、发私见的“做闲书”。作为现代小说语义转型的重要参与者，尽管鲁迅“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⁴⁷⁾，但因其“为人生”的启蒙诉求，鲁迅也在有意无意间实现了小说之为“闲书”的文化语义再造。

第一，鲁迅的小说史研究、小说翻译是对“闲书”小说的“反围剿”，鲁迅在多方面致力于为中国小说文类增添关涉“人生”的思想语义。

诚如周作人所看到的，中国社会“对于小说不是当他作闲书，便当做教训讽刺的器具、报私怨的家伙，至于对着人生这个问题大底毫无意见或未曾想到”，周作人强调，“目下切要办法也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著作，但其先须说明小说的意义，方才免得误被一般人拉去，归入子部杂家或并入精忠岳传一类闲书”。⁽⁴⁸⁾而鲁迅正是从中国小说史研究、外国小说译介两方面入手，持续对中国“闲书”之“闲”作着价值评估，对小说的“闲书”性质作着切实的语义改造。

其一，作为中国市人文化观察者，鲁迅颇爱看“闲书”：“我就是常看造谣专门杂志之一人，但看的并不是谣言，而是谣言作家的手段，看他有怎样出奇的幻想，怎样别致的描写，怎样险恶的构陷，怎样躲闪的原形。造谣，也要才能的，如果他造的妙，即使造的是我自己的谣言，恐怕我也会爱他的本领。”⁽⁴⁹⁾其二，鲁迅对中国民族性的观察探讨亦多源自野史杂说等中国传

统“闲书”。鲁迅曾感叹：“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从小说来看民族性，也就是一个好题目”，⁽⁵⁰⁾正是因此，鲁迅会看到旧小说家“豪语的折扣”，能够从《九尾龟》中约略看出中国流氓的样子，观察《迦茵小传》“只译半部”的译介状况，得出民国社会对婚姻的见解。其三，鲁迅视中国旧有的“闲书”小说为“反围剿”对象。在鲁迅看来，“中国原来还有着一标布满全国的旧式的军马，这就是以小说为‘闲书’的人们”^⑤。作为小说实绩者，鲁迅以小说家、翻译家身份侵入文坛，以“叫喊和反抗”主题的东欧文学，特别是以俄国文学为思想资源，在对“作为闲书的小说与英美时行的小说”等三标新旧的大军的反围剿中，“为人生”的小说在思想革命的进程中逐步得到正名以至于兴盛。可以说，为“闲书”作史，以“闲书”观中国社会，鲁迅以“闲书”为文化资源，实现了对中国旧小说的认知理性、价值理性追认，在与“旧式军马”的文化竞争中，小说文类增添了“为人生”的思想启蒙语义。

第二，鲁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射性有着深入的了解，其小说创作亦被“文坛消息家”“批评家”视为讽刺影射的“闲书”。饱受小说私怨影射认知困扰的鲁迅持续在这样的小说批评观念中突围。

“假小说以施诬蔑之风，其由来亦颇古矣。”⁽⁵¹⁾鲁迅在其小说史研究中便注意到“假小说以排陷人”的文化现象，发现了作影射、发私怨是中国小说的固有观念。例如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周秦行纪》等便含有“假小说以攻击人的风气”⁽⁵²⁾，而“明人小说之讲秽行者，人物每有所指，是借文字来报夙仇的”^⑥，诸如《金瓶梅》等明人情世小说，在鲁迅的研究中也是报私仇的产物。而近现代以来，鲁迅观察到，不仅有“林琴南攻击文学革命的小说”⁽⁵³⁾，更多有滥竽充数的“谣言文学”⁽⁵⁴⁾。而从对鲁迅小说的接受来看，在《申报》的评论文章中，就有“鲁迅的书，从前是学生们的消闲书”的话语，⁽⁵⁵⁾鲁迅小说也很大程度上被当做“闲书”。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与小说文化批评揭示出，无论是传奇作意、世情言说，乃至谴责谩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小说的虚构性从来不是小说性质的主要方面，“视小说为非斥人则自况的老看法”是中国社会对小说的固有认知。

同时，作为小说作者，鲁迅一直以来经受着文坛消息家、批评家来回的“侦查”，以《阿Q正传》、《故事新编》为代表的诸多小说持续被批评家看作是发私怨、作讽刺的人物影射。鲁迅对这样的评论尤其在意，所作多篇小说创作谈便意在匡正那些关于小说的闲话。在鲁迅看来，事件一旦“写在小说里，人们可就会另眼相看了，恐怕大概要被算作讽刺”，一些分明是事实的事件，皆被认作讽刺，好些直写事实的作者，就这样被蒙上了“讽刺家”的头衔。⁽⁵⁶⁾可见，正是出于小说创作是“做闲书”“报私仇”的观念，无论是否具有讽刺目的，事实一旦通过小说文类表达出来，小说家不可避免地被视作“讽刺家”。“小说里面，并无实在的某甲或某乙的么？并不是的，倘若没有，就不成为小说。”⁽⁵⁷⁾鲁迅反复强调自己的创作不是为了骂谁，⁽⁵⁸⁾持续为社会上“知其然”的文学批评提供自己创作时真正的“所以然”，一次又一次地在书信或杂文中对小说观念积习作出辨认真思，一次又一次地以小说虚构观回应影射报私观。在启蒙意图与私怨影射的观念交锋中，显现了现代小说认知转义的艰难。

第三，作为小说出版者，深恶称小说为“闲书”的鲁迅又不得不与作为社会意识、阅读功能的“闲书”和解。在对己身“有闲”的自我嘲讽与确认中，鲁迅以真切的小说出版践行着启蒙改良旨归，有意无意进行着对“闲书”的语义改造。

鲁迅曾在《〈竖琴〉前记》中说到过中国的“闲书”与“英美时行的小说论”发生着“合流”。⁽⁵⁹⁾又诚如周作人所言，“欧洲文学的小说与中国闲书的小说，根本全不相同，译了进来原希望可以纠正若干旧来的谬想。岂知反被旧思想同化了去，所以译了迦茵小传，当泰西非烟传红楼梦看，译了鬼山狼侠传，当西虬髯客传、七侠五义看；又将查白士书店编给小孩作文练习用的短篇故事译成了诗人解颐语，当作泰西聊斋看”⁽⁶⁰⁾，小说之为“闲书”，实际上表现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文化意识。

阅读是一种无可非议的消遣，“消闲”是小说的固有功能。即如郁达夫所言，“中国一向就把看书当做消闲的动作，故而对那些小说笔记之类的册籍，统叫做闲书，说他们的无关大体，得遭闲时，我以为这一个称呼，实在是最简洁适当也没有的了”⁽⁶¹⁾。尽管鲁迅对“闲书”颇有意见，但他实际也观察到“诗歌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⁶²⁾。鲁迅尤其注意到“穷人们也爱小说，他们不识字，就到茶馆里去听‘说书’，百来回的大部书，也要每天一点一点的听下去。不过比起整天做活的人们来，他们也还是较有闲暇的。”⁽⁶³⁾站在小说阅读、小说消费、小说大众传播的立场上，小说是“闲书”，这是作为小说文化生产者的鲁迅所不能改变也不能忽略的事实。但在现代小说文化兴起的过程中，鲁迅观察到：“小说的地位提高

了，作品也大进步，只是同时也孪生了一个兄弟，叫作‘滥造’。”⁽⁶⁴⁾产业化的小说生产模式受制于文学商业化，在拓展文学文本接纳范围的同时，小说自身的审美价值也遭受损失，一大批滥造的小说样式被纳入到文学场域中。

不能忘却成仿吾“三个有闲”的指责，在对己身“三闲”的自嘲与确认中，鲁迅1931年创办三闲书屋。鲁迅以切实的小说出版实践投入到小说文化市场竞争中。诚如鲁迅对三闲书屋出品的《毁灭》《铁流》等小说的评介所言：“虽然粗制，但并非滥造，实在够使描写多愁善病的才子 and 千娇百媚的佳人的所谓‘美文’，在这面前淡到毫无踪影。”⁽⁶⁵⁾以“三闲”为名的“三闲书屋”是鲁迅对“闲书”的文化突围：“敝书屋因为对于现在出版界的堕落和滑头，有些不满足，所以仗了三个有闲，一千资本，来认真介绍诚实的译作，有益的画本，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宁可折本关门，决不偷工减料。”⁽⁶⁶⁾尤其在“民族英雄”肖像被印刷出卖、小兵们的血和伤痕被人糟蹋的抗战时期，在对《大上海的毁灭》这样很有几句“警句”的“闲书”的指摘与拒斥中，⁽⁶⁷⁾鲁迅积极从事战争救亡小说的译介出版工作，以自己的“三闲”实现对滥造“闲书”的文化突围。

注释：

1 关于中国“小说”概念古代语义演变、中西经验对接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可参见谭帆、王庆华：《“小说”考》，《文学评论》2011年第6期；宋莉华：《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中西对接》，《文学评论》2020年第1期。

2 参见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3页。

3 参见仲密：《论“黑幕”》，《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6号。

4 参见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5号。

5 周作人：《鲁迅读古书》，《周作人自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3页。

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10页。

7 鲁迅：《孔乙己》，《鲁迅全集》第1卷，第461页。

8 鲁迅：《〈死魂灵百图〉小引》，《鲁迅全集》第6卷，第461页。

9 鲁迅：《〈十月〉首二节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360页。

10 鲁迅：《十四年的“读经”》，《鲁迅全集》第3卷，第136、136页。

11 黎锦熙：《“读经问题”解嘲》，《国语周刊》1925年第24期。

12 鲁迅：《这个和那个》，《鲁迅全集》第3卷，第148页。

13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7页。

14 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第298页。

15 鲁迅：《不是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243页。

-
- 16 鲁迅：《阿 Q 正传》，《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512 页。
- 17 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 7 卷,第 116 页。
- 18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167 页。
- 19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 年创刊号。
- 20 陈独秀：《独秀识》，《新青年》1917 年第 3 卷第 1 号。
- 21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1917 年第 2 卷第 5 号。
- 22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 4 卷,第 525 页。
- 23 鲁迅：《马上日记》，《鲁迅全集》第 3 卷,第 326 页。
- 24 鲁迅：《通信》，《鲁迅全集》第 4 卷,第 98、98 页。
- 25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 3 卷,第 436 页。
- 26 鲁迅：《〈草鞋脚〉小引》，《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21 页。
- 27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 9 卷,第 251-257 页。
- 28 鲁迅：《谈金圣叹》，《鲁迅全集》第 4 卷,第 542 页。
- 29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 9 卷,第 329 页。
- 30 鲁迅：《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301 页。
- 31 鲁迅：《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鲁迅全集》第 7 卷,第 404 页。
- 32 鲁迅：《辩“文人无行”》，《鲁迅全集》第 8 卷,第 394、394 页。
- 33 鲁迅：《〈某报剪注〉按语》，《鲁迅全集》第 8 卷,第 241 页。
- 34 鲁迅：《自序》，《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442 页。
- 35 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 2 卷,第 354 页。
- 36 鲁迅：《答北斗杂志社问》，《鲁迅全集》第 4 卷,第 373 页。
- 37 鲁迅：《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300 页。

38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249 页。

39 鲁迅：《致徐懋庸》，《鲁迅全集》第 12 卷，第 526 页。

40 鲁迅：《不应该那么写》，《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321 页。

41 鲁迅：《“京派”和“海派”》，《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315 页。

42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 3 卷，第 440 页。

43 鲁迅：《〈总退却〉序》，《鲁迅全集》第 4 卷，第 638 页。

44 鲁迅：《〈竖琴〉前记》，《鲁迅全集》第 4 卷，第 444、444 页。

45 郁达夫：《闲书与闲人》，《青年界》1936 年第 10 卷第 1 期。

46 仲密：《论“黑幕”》，《新青年》1917 年第 2 卷第 6 号。

47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 4 卷，第 526 页。

48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新青年》1918 年第 5 卷第 1 号。

49 鲁迅：《归厚》，《鲁迅全集》第 5 卷，第 389 页。

50 鲁迅：《马上日记》，《鲁迅全集》第 3 卷，第 351 页。

5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 9 卷，第 74 页。

52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 9 卷，第 323、340 页。

53 鲁迅：《“中国文坛的悲观”》，《鲁迅全集》第 5 卷，第 264 页。

54 鲁迅：《归厚》，《鲁迅全集》第 5 卷，第 389 页。

55 李岚：《如何使文化人有工作可做》，《申报月刊》1943 年第 1 卷第 3 号。

56 鲁迅：《论讽刺》，《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286 页。

57 鲁迅：《〈出关〉的“关”》，《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537 页。

58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 4 卷，第 527 页。

59 鲁迅：《〈竖琴〉前记》，《鲁迅全集》第 4 卷，第 444 页。

60 仲密：《论“黑幕”》，《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6号。

61 郁达夫：《闲书与闲人》，《青年界》1936年第10卷第1期。

62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13页。

63 鲁迅：《〈总退却〉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638页。

64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编选感想》，《鲁迅全集》第8卷，第427页。

65 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394页。

66 鲁迅：《三闲书屋印行文艺书籍》，《鲁迅全集》第8卷，第505页。

67 鲁迅：《对于战争的祈祷》，《鲁迅全集》第5卷，第43页。